

爱泼斯坦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认识*

张德明

提要：抗战时期，波兰记者爱泼斯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颇为关注，并对中共军队的作战及部队建设情况进行介绍，还注意到密切的军民关系；他对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特别是对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书写颇多，并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他对中共在抗战中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所考察，对中共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改革与国共关系的处理给予了肯定。爱泼斯坦从外国人亲历者的视角全方位地观察了抗战时期的中共，同情并支持中共抗战，向国内外社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爱泼斯坦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延安

抗战时期，许多外国记者来华进行采访报道，还有一些外国记者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向国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事迹，而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爱泼斯坦为著名的国际友人、记者，1917年随父母从波兰来到中国，早期曾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抗战时期担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并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曾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实地采访，1944年还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到延安采访。他根据其在抗战经历，曾出版了《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等专门的著作，并在1949年后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对中共抗战情况也有详细介绍。目前学界关于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对中共抗战的报道研究较多，但有关爱泼斯坦对中共抗战的认识研究相对薄弱^①。本文主要利用爱泼斯坦的相关论著，探讨其对抗战中的中共军队、抗日根据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从来华外国人的角度客观看待分析中共抗战的真实境况。

一 对抗战中的中共军队的关注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进行敌后游击战，重创了日伪军，取得了突出的战绩，爱泼斯坦对此也进行了关注，并亲身体验了八路军的游击战。他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并对中共的部队建设、军民关系等有所论述，构建了真实的中共军队形象。

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日不同，中共则是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并逐渐建立抗日根据地，爱泼斯坦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于敌后游击战开展的前提，他指出：“共产党军队看准了日军战线拉得太长，有鞭长莫及这个弱点，在防守力量薄弱的敌人据点之间有广大的空隙地区可以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敌后辽阔的农村地区就这样逐步成为解放区。”^②他对于八路军之所以可以成功开展游击战则指出：“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16KZD021）的研究成果。

① 徐锋华等：《“他者”笔下的中国——爱泼斯坦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史林》2018年第5期）及柳欢：《爱泼斯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党史博览》2019年第2期）等论文对爱泼斯坦对中共抗战的认识有所涉及，但是叙述较为简略。

②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历史不应忘记：爱泼斯坦的抗战记忆》，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战斗中都密切配合，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或正规军为主。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使我们确切地了解所处境况。”^①从实施效果上看，由于中共制定了一整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纲领与方针，坚持全民族抗战与持久战，在抗战中的战绩令人瞩目。爱泼斯坦提及中共通过抗日极大提升了其在全国的威望，指出：“在全国，共产党的威信远远超过了它的人数或权力。这是因为它在战场上和在它参与决定政策的地区表明了，它对全国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它坚持抗战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一事实得到普遍的承认，因而不仅学生们纷纷拥入延安抗日大学，而且总参谋部（过去它的主要任务是打红军）也欢迎共产党的将领们参与它的决策，在进行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方案中采纳他们的建议。”^②受中共的影响，当时很多国民党军官还曾在游击战训练班中接受过中共将领的培训，并且国民党也曾组织军队进行敌后游击战。

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爱泼斯坦还对新四军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他曾于1938年1月在武汉访问新四军军长叶挺，了解到新四军军费的困难称：“新四军在政府里只拿到很少的军费……新四军和地方行政当局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她也不能在税收里取得一部分，她的特别服务的基金只能得自老百姓的自由捐募，以及国内国外的同情者的捐募。但这些捐募的总数是很微小的。”^③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是其取得战斗胜利的有利保证，是中共军队的鲜明特征之一，爱泼斯坦对此也深有体会，指出：“新四军连以上的所有单位都设有政委或政治部。他们的这个制度同北方八路军和游击队是一样的。政委是他所在部队的组织者和教育者。他的责任是，保证这个部队成为有觉悟的、战斗的机体。他不仅有权监督战士，也有权监督司令员。作战方案都是在他参加之下作出的。他既有很大的权力，也有重大的责任。一旦定出作战方案，军事指挥员就下命令。政委对它的执行负有责任，必须带头贯彻。”^④他对新四军的具体运转及日常活动则分析称：“新四军确实是一支统一战线的军队。它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队伍主要是由以前红军游击队员组成的。它的辅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的效率，使之能够改造它所活动的整个地区。在这些辅助事业中，有四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主要是军队建立的小工业群、军队的培训学校、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队及医疗服务。”^⑤爱泼斯坦的这些论述颇为准确，让外界特别是国外熟悉了抗战时期新四军的真实发展境况。

对于抗战时期在华北地区活动的中共八路军部队建设及作战情况，爱泼斯坦也有描述。与国民党部队的军阀作风不同，他特别对八路军的官兵平等指出：“八路军本身，从连队以上，选出经济委员会，监督定量供应，正当的伙食费开支等。这些委员会的官员和一般人一律平等。这些委员会能拿出有每个士兵需求的账目并能清楚地看出从部队的生产中每人所得是相同的。”^⑥对于八路军正规部队与民兵游击队的关系，他分析的颇为透彻，指出：“民兵缴获的所有装备都留在自己手中，八路军给他们补充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和军火弹药。八路军驻军不管人数多少，不管是暂时还是长久驻扎，他们的司令员承担的义务之一就是指导民兵搞军事训练。”^⑦对于八路军在军事上的具体作战形式，爱泼斯坦1944年8—9月曾前往八路军晋绥军区采访，了解敌后游击战的性质、深度及形式等，在 frontline 亲历了八路军与游击队、民兵及人民配合作战，认为：“这些

①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

②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历史不应忘记：爱泼斯坦的抗战记忆》，第334页。

③ 爱泼斯坦：《我所知道的新四军》，贝尔登等：《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远东书店，1941年，第66页。

④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国际友人笔下的新四军》，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⑤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历史不应忘记：爱泼斯坦的抗战记忆》，第113页。

⑥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27页。

⑦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14页。

作战并不是防御的而是进攻的，这些作战是胜利的作战，这些作战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所需要的。”^①而且他还在著作中曾记述见证的两次八路军对日伪军袭击的详细战况，并对八路军的作战进行分析指出：“八路军目前作战的性质，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体会到。尽管他们在武器装备上不能对付敌军大部队的集中攻击，八路军和它的辅助军事组织却总是采取攻势，使敌人中计，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样不仅使敌人蒙受损失，煞敌人的威风，并缩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控制区，扩大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和人口，而且有利于防止敌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进行报复。”^②由于当时国民党攻击八路军为“游而不击”，对于时人关心的八路军是组织松散的游击队还是正规军的问题，爱泼斯坦则认为：“八路军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正规军，采用游击战术，与两种人民武装力量协同作战：其一是游击分队，它们虽然不是正规军，却可以遵照命令根据战术的需要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是自愿组成的民兵自卫队，只在他们自己的城乡附近作战。”^③他还在著作中具体论述了八路军的游击战如何灵活有效的开展及地雷战等特殊战法，对他们不断取得的出色战绩高度肯定。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拥护，建立了令人称道的军民鱼水情。爱泼斯坦对中共特有的军民关系颇有感触地指出：“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④对八路军可以赢得民众支持的原因，他精辟地解释称：“八路军就用事实表明了自己是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后甩掉了自己身上的负担，并深深体会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八路军才要求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保卫国家。群众懂得，保卫国家，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在这里，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权利，第一次可以作为人、作为公民过一种体面的生活。”^⑤而且他还注意到当时八路军建立大青山根据地，赢得蒙古族同胞支持，他叙述道：“八路军到来后，蒙古人发现它完全是一种新型的中国军队。他们不是发号施令，而是号召蒙古人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战斗。蒙古人民收复的失地，由蒙古人按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语言自己去管理。它给这个殖民地人民带来了解放和良机，而不是另一种奴役。并不是只有劳动大众才响应八路军号召，连僧侣和部落的王公也开始参加战斗。”^⑥这也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广泛联合发动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共同抗日的具体表现。

当时国外舆论对八路军、新四军经常混为一谈，爱泼斯坦还仔细比较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对于两军的异同及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也是其报道的特殊之处。如对于两军的军事活动，他认为：“八路军拥有数十万兵力，主要是在它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地盘活动。新四军则不同，它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盘内，要受在它来之前早已建立的军政当局的管辖。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八路军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是单独作战的。新四军则是东战区诸种军事力量中的一种。它必须接受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仰赖它的财政和给养。在兵源的补充方面，它没有华北游击

① 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第91页。

② 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③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05页。

④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

⑤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历史不应忘记：爱泼斯坦的抗战记忆》，第88页。

⑥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委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280页。

队那种自由。”^①当时两军的作战区域，面临的抗日形势都有差异，爱泼斯坦还对抗战时期两军各自的生存环境进行分析指出：“新四军工作的政治条件与八路军相比有很大不同。八路军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延安地区）有自己的后方根据地。那里人民的力量由于政治和经济改革已经调动起来。新四军作战地区的政府还被旧的地主和国民党官员控制着。共产党除了作为作战部队的成员外，不允许合法存在。八路军可以自由地在群众投票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的管理政策。新四军只能在现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范围内作为一支纯粹的军事力量行动。”^②他还注意了两军的协同作战，对于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共同开展的抗日伪军的反攻，指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攻势是自从1940年百团大战以来所有根据地的第一次协同进攻。如果两条战线合在一起看，这是自从1938年台儿庄战役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攻势。但是在形式上仍然是由各自为战的游击行动所组成。解放区部队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使之仍然被迫避免进攻大城市和日本的重要中心。”^③由于他在抗战时期都实际亲身接触过八路军、新四军，故其相关报道叙述在当时则更为可信。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于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作战成绩，爱泼斯坦给予了高度肯定。如他对中共在抗战中充分发动广大民众参与抗战，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成绩进行综合评价指出：“在党的指导下，日寇占领区的每个角落都广泛地开展了运动战和游击战，党唤醒了千百万人满怀希望和信心，果敢地投入与日寇的战斗。在这些群众创建的武装力量中，以前所未有的比例，涌现出无数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拳头’。1935年英雄的长征结束时，中国红军减少到仅有3万人。而到1945年，人民军队经过持续作战，已发展到91万人，另外还有250万人以上的辅助的武装民兵队伍。”^④中共军队在抗战后期逐渐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主力军，他对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造成的沉重打击曾称：“人民武装力量以持续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力量对比悬殊、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作战。他们避免进攻强敌盘踞防御的大城市，而集中力量粉碎敌人每一次对农村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他们挫败了主要由应征而来的农民所组成的伪军，或通过各种军事和政治手段使其保持中立。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打死打伤的敌人人数总计有96万多，还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同时完成了革命农村对城市的包围。”^⑤他的这些叙述是客观真实的，并注重不同阶段的比较，向外界介绍了中共在抗战中的具体发展状况。

二 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观察

爱泼斯坦抗战时期曾到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等抗日根据地实地采访，亲身经历了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在论著、书信中对中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并根据实际观感给予了评价，特别是还对访谈的中共领导人的形象进行了细致描述，展示了抗战时期“红色中国”的多重面相。

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形式上，各级政权实行民选政府与民主政治，爱泼斯坦对此深有感触。他曾描述称：“中国解放区和边区的9000万人民选举自己的各级政府。所有18岁以上的男

① 爱泼斯坦著，贾宗谊译：《人民之战》，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

② 爱泼斯坦著，张立程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

③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国际友人笔下的新四军》，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413页。

④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78页。

⑤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79页。

女都有选举权，在与自己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运用这种权利，选择管理村子的村长和委员会。他们还选举参加乡、区和地区人民委员会的代表，这些委员会不同于国民党中国的任命及纯粹是磋商的机构，他们确实制定法律并进行治理。”^① 他于1944年在延安考察后对于当地的民主政治情况则进一步分析指出：“这里除了制止封建主义以外，没有号召任何社会革命来使其他地方奉行同样的路线。此地仍然有许多地主、资本家等等人物，他们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工作，并且还是在当地政权机关工作。不同的是，这些地方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因此农民在其中占了绝大多数，因为他们在人口中也占了绝大多数。”^② 爱泼斯坦的这些叙述，用事实证明了抗战时期的中共是在真正地实行民主政治，与国民党借抗战行独裁形成鲜明对比。

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面对国民党、日军的经济封锁，在经济上存在很多困难，被迫在根据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爱泼斯坦对此举给予高度肯定。如他对于中共在抗战时期倡导的大生产运动介绍称：“先是延安后方基地地区，后来是所有解放区、驻军部队、政府机构和学校都接到命令要尽可能自己生产自己的食品和服装。每一个小组都分到一小块农民觉得耕作不合算的荒地。每个军官、士兵、官员、教师和学生，每天至少要用两小时开垦这些荒地或从事其他生产性劳动。”^③ 他还注意到陕甘宁边区科研力量不足，也被迫通过研究作为边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称：“技术和教育人才缺乏，工具器材的缺乏更甚。因此，各部门研究工作的中心都是要求提供临时应急的手段和方法并找出可用以代替那些无法从外部得到的物资的本地代用品。”^④ 对于根据地实行自力更生的效果，他则指出：“每个村庄都有各式各样的食品，军民都丰衣足食，而在短短几年之前这个地区还养活不了他们。确实不错，军队种地，还有经济官，但是这是农业和工业生产自助计划的一部分，正是这个计划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中国其他任何部队的水平都高。”^⑤ 这些措施也间接减轻了农民田赋的负担，正如其所称：“因为驻军，政府机关的人员，大学生，以及其他团体，都有荒地开垦，至少生产他们自己一部分的食粮，减少了对谷物征收的依赖性。”^⑥ 正是此种政策的充分实施，帮助根据地度过了经济上的难关，实现了丰衣足食。

爱泼斯坦还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一些特有做法进行了观察。如他对根据地国有、私有经济并存的特殊战时经济体制指出：“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但不垄断权力。相反，它正在努力完善一项能获得社会所有集团支持的政策——基础工业（如军火）国有，其他为集体和个体所有；商业由合作社和个体经营；土地私有（小农占有小块土地是典型形式），同时鼓励农民组成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以从事农业生产、分配消费品、开展副业、开办信用业务，以至医疗服务。”^⑦ 而且当时根据地还免去企业的税收，鼓励私有工业的发展。他还指出陕甘宁边区在条件困难情况下，通过评选“劳动英雄”来增加群众生产积极性，并注重农业合作，特别对新出现的“变工组”叙述称：“边区农民组成了许多‘变工组’，共同耕作各自的土地，开垦荒地的收入则平均分配。这样，边区的土地虽然仍属个人所有，劳动已实行集体化，并且随着荒地的开发，集体财产也出现了。变工组加快了播种和收获的进程，连地里送饭的事也简化了。”^⑧ 值

① 爱泼斯坦著，张立程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226页。

②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74页。

③ 爱泼斯坦著，张立程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235页。

④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96页。

⑤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70页。

⑥ 爱泼斯坦：《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第2版。

⑦ 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⑧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54页。

得一提的是，1944年7月29日，爱泼斯坦还特意发表文章戳穿了当时国民党报刊上宣传的“中国共产党种鸦片”的负面舆论，用自己在延安的亲身见闻依次驳斥了当时的各种谣言，他指出：“根据这些事实和考虑，本记者愿以本人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明白无误地声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国和国外谈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正在种鸦片的罪状都是无稽之谈。”^①

在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方面，194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是中共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与空前的团结，爱泼斯坦也进行了深刻分析。他对该运动的性质介绍指出：“整风运动的宗旨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我教育，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上。这与学院式的教与学截然不同。通过研究学习和热烈的讨论，全党、各个基层组织、每个成员的真实经验都得到总结，他们都或长或短地经历过实际斗争，有过成功和失败。”^②对于该运动的积极影响，他认为中共已能依据本国经验在中国革命中进行独立判断，对过去的错误路线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分析指出：“这是一场解放思想和恢复活力的运动。在共产党看来，它使全党通过全面领会整风精神而达到思想认识的统一从而武装起来，不仅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在随之而来的反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③他还注意到在整风运动的带动下，在延安的边区政府反对形式主义，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称：“在模棱两可，空话连篇，特别是有些人不是为了清楚明白地表达而引经据典地用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话吓唬人或卖弄学问，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笑话。但这里人们对理论学习是很认真的，目的是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有实际帮助。对所有理论、计划的检验方法是实践。”^④此外，爱泼斯坦还对延安为代表的根据地文化教育、群众文艺活动等论著中进行了大量叙述，让外界充分认识了蓬勃开展的红色抗日文化事业。特别是他还注意到大量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士来到根据地服务，指出：“从1940年的上半年起，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把乐观和信心传导至四面八方。”^⑤

由于国民党在宣传上的恶意诋毁，国外对中共领导人存在颇多误解，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爱泼斯坦在抗战期间接触了多位中共领导人与将领，对他们务实高效的形象在论著中有生动且真实的描述。特别是1944年，爱泼斯坦在延安采访了多位中共领导人，并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他于当年6月采访毛泽东，认为其表现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且访谈不设时间限制，与蒋介石在举止方面有强烈反差，并且善于将复杂问题用简单深刻的话说出来，尤其对其“好整以暇”“举重若轻”印象深刻。对于毛泽东的性格，他生动叙述称：“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⑥1945年，他在美国发表的文章仍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称：“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虚。”^⑦1944年7月，

①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71页。

②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80页。

③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81页。

④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72页。

⑤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81页。

⑥ 《今日中国》杂志社编：《爱泼斯坦画册》，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⑦ 爱泼斯坦：《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许之桢编译：《毛泽东印象记》，东北书店，1946年，第9页。

爱泼斯坦还采访了朱德，对其印象描述为和蔼可亲与质朴，称：“从外表看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长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① 爱泼斯坦在武汉、重庆期间曾多次见到周恩来，1944年10月期间也在延安对周恩来围绕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采访，并认为其作风始终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是一个有修养、有原则、有责任心与内在力量的人。^② 可见爱泼斯坦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比较注重细节的描述，同时又形成自己独有的认识，对国外读者了解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抗战时期爱泼斯坦在根据地的实地采访，直接影响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特别是1944年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对中共的未来寄予厚望。他在当时给妻子的信中曾称：“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③ 而对于延安之行，他曾称此次令人难忘的访问影响其走上革命道路，并指出：“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④ 实际上之后国共历史发展的走向，也充分印证了其预言。

三 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探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联合国内各阶层、团体共同抗日，是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抗战时期，爱泼斯坦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接触，对中共坚持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抗日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分析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对统一战线过程中国共两党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

爱泼斯坦对中共在抗战中建立团结各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给予肯定。他分析了中共通过联合一切抗日团体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称：“共产党人被告知，如果敌人成功占领了他们的地盘，他们不能有任何程度的撤退。相反，他们要通过已经准备好的与农民、工人、非共产党爱国者以及国际友人建立的联系，带头建立敌后武装斗争的岛屿，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与一切可能出现的其他抗日武装组织结成联盟，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⑤ 对于中共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现得到了各阶层的支持，他则认为：“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在八路军占领区我们遇到了许多非共产党人士——现在指挥八路军军团和小分队的前中央军军官，中国各大学的前教授和毕业生，在战前并无左翼历史背景的学者、作家等。”^⑥ 该叙述也是生动反映出抗战时期各阶层纷纷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的场景。

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对国民党联合抗日，但对其反共摩擦又坚决进行斗争的策略。对于抗战时期的复杂国共关系，爱泼斯坦也有深刻观察。他对中共的联蒋抗日政策分析称：

①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61—62页。

② 参见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231、236页。

③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219页。

④ 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3卷《杰出人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⑤ 爱泼斯坦著，张立程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93页。

⑥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36页。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民主抗日团结的政策，自日本入侵东北以来，它使这种政策日臻完善。在西安事变中，东北军扣留了蒋介石，特请共产党人来进行磋商……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主张释放蒋介石，让他继续掌权，这并非故作惊人之举，而是因为如果采取别的方针，就会导致内战，但当时全中国，除了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和卖国贼外，都迫切要求团结。”^①他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破坏国共团结的行为进行批评，并肯定共产党的应对策略，指出共产党采取了灵活的“既团结又斗争”策略。在军事上，“针锋相对”地击败它的进攻，但在斗争中又时时注意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使冲突扩大，不引发大规模内战，不给日本人和极端反动派以可乘之机。在政治上，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对全国人民的每一次挑衅，号召人民巩固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注意让海外民主舆论得知他们在做的事情。这样做有助于扩大“左”派的影响力和威望，扩大自己的阵营，并争取中间派，同时揭露和孤立背信弃义的右派。^②而且他还分析了两党在抗战时期不同走向，指出：“当国民党统治集团既背叛全民族，又背叛自己军队的士兵，靠掠夺国统区人民积聚起惊人的财富时，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高高举起了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在反对侵略者的不懈战斗中，他们在数量和影响上都成倍增长了。”^③从上述分析看，爱泼斯坦的认识也是准确把握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与斗争的历史实际，展示了中共一贯为了抗日事业而顾全大局的爱国形象。

对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与调整，爱泼斯坦分析较多。如中共为联合各党派、阶层抗日，在根据地各级政权组织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爱泼斯坦曾亲历1944年7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并以此为例对“三三制”分析称：在联席会议的27名委员中只有8名是共产党，其他人中，1名是国民党、1名是救国会，2名是“无党派人士”。从职业上分，与会的政府和常委委员中有2名地主、6名较小的士绅、几名知识分子和教师、1名医生、1名士兵、一位留着长须的毛拉（伊斯兰学者），还有店员、佃农和贫农。^④抗战时期，中共一改之前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政策，而且还赋予他们选举权，他对此也分析指出：“在解放区中国，仍然有地主，他的财产权受到尊重。但是，抗战那几年夺去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他不再是村里的主人。选举村长和委员会时，地主像他最穷的佃农一样，只有一票。”^⑤这也是中共根据抗战的实际做出的灵活调整，有利于争取地主阶层参与抗战。

对于中共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吸收进步力量加入地方参议会与各级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等各项改革，爱泼斯坦认为顺应了抗日需要，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对此深入分析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得到了完全的政治权利，而且在大幅度减租减息中，他们的经济也得到很大改善（为了争取各阶层最大限度的团结抗日，当时还没有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所有阶层的爱国人士在解放区的行政机构中都有代表。解放区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等都服务于人民和民族的抗战。”^⑥他专门对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改革分析指出：“边区政府一建立就认

① 爱泼斯坦著，贾宗谊译：《人民之战》，第11—12页。

② 参见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79页。

③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77页。

④ 参见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57页。

⑤ 爱泼斯坦著，张立程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228页。

⑥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78页。

识到，它不仅要在军事上打击侵略者，而且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同他们进行竞争。针对伪政权，它建立了以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民主制。针对日本人的残酷剥削，它改善了人民生活。针对日本人把中国人变为负担沉重的亡国奴，它打破了束缚人民群众主动精神的枷锁，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把这些力量协调起来。这就构成了它正在建立的战斗的民主制度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之基础。”^①而且他还称赞晋察冀边区政府在贯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口号方面堪称模范。此外，他还注意到受减租减息政策影响，根据地的地主资本向工业转移这一特殊现象，他指出：“共产党农业改革方面最有趣的结果，是地主资本转移到工业去。因为佃农富有了，同时又可向边区银行借得低利的信用贷款，他们常常被允许去购买土地来自己耕种。地主呢，地租收入比以前少了，但被工业投资所吸引，因工业是免税的。”^②此现象甚少为其他外国记者所关注，可谓是爱氏的创新型报道之一。

爱泼斯坦还分析了针对国民党对根据地经济封锁，切断外界对根据地后方对前线的各种物资供应，中共未采取军事行动反击，而是从内部调动各方面资源解决经济困难，这也是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之道。他指出：“八路军本当时是能够以武力冲破封锁的，但是毛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会使中国内部发生全面冲突，这是日本人久已求之不得的事。相反的，他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主持了一次经济资源的充分调查，并且使每一个人都为发展资源而工作。”^③他对于根据地针对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应对之策进一步分析称：“他们成功地把穷乡僻壤的群众组织到一起，投入农业和小规模（大多是手工业）企业生产的高潮。在只有村庄和小镇经济的基础上，他们生产出的产品不仅能够供应战争的需要，还为军队和老百姓提供了充足的衣食……人民军队在不打仗时自己生产大批粮食保证自己的供应，最大限度减少农民的负担。”^④从爱氏所述可以看出，为了维护国共团结抗日的大局需要，共产党在经济方面的灵活应对也是富有成效的。

爱泼斯坦还描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的各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赢得人民支持，为民众参与抗战进行了充分动员。他分析认为：“相对边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落后环境而言，它实行动员的尝试与中国其他地区形成尖锐的对比。这是由于边区的动员具有民主性质并运用民主方法。工人和农民能分享每一项生产发展的成果，爱国热忱和积极性到处弥漫。”^⑤他对中共进行广泛动员的具体做法分析则指出：“边区建立这种广泛的动员，用的方法差不多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法令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村为民主选举的基本单位，减轻农民的田租和利息的重荷，由于农民对多做工作能多得剩余的信心提高，大大地鼓励了生产，由于提高了生产的愿望，合理的方法和合作社组织发展起来了，由于农民对保全并增加从未有过的幸福有了决心，便生长了一种极明显的自觉的抗日的爱国主义。”^⑥正是由于广大民众积极支持共产党抗日，才为最终赢得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爱泼斯坦还看到中共通过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中不仅逐渐壮大，而且赢得社会各界的称赞，在包括国统区、沦陷区在内的全国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指出：“在反抗日本帝国

①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历史不应忘记：爱泼斯坦的抗战记忆》，第102页。

② 爱泼斯坦：《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第2版。

③ 爱泼斯坦：《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新群众》1946年第1卷第4期。

④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79页。

⑤ 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第197页。

⑥ 齐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第7—8页。

主义的战争期间，共产党逐渐得到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承认。这是必然结果，因为共产党维护和代表了作为民族主体和绝大多数的全国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共产党党员的人数从1937年的约4万人，增至1945年的120万人。”^①他还注意到国际友人在根据地支持中共抗战，指出：“解放区像一块磁石，吸引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日本共产党领导的一个英勇的日本爱国团体，其中有许多是曾因反对日本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坐过监狱的志士。在解放区你还可以看到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爱国者……在反对中外反动派结成的所有联盟的过程中，中外人民缔结了战斗的友谊，而延安是该友谊的源头。”^②而爱泼斯坦既是当时亲身见证了中共抗战，又是坚定同情支持中共抗战的国际友人代表之一。

结 语

作为亲自到抗日根据地及延安访问过的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认同中共的抗战政策，用自己发表的著作、新闻报道向国内外正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事迹，打破了在国民党及日军的大肆污蔑丑化下外界当时对中共的种种误解与偏见，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获取国际的支持提供了舆论帮助。他的报道从外国人亲历的视角还原了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的真相，全方位介绍了中共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诸多抗战细节，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时人曾对其所著的《人民之战》一书评价称：“爱泼斯坦氏的叙述，就全然不是空洞的议论或抽象的描写，相反的却是全部都用真实的事实来印证，整个是一堆堆生龙活虎材料底堆垒。”^③而且爱泼斯坦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分析解读越发透彻，这在其不同时期出版的相关著作中都有体现。

爱泼斯坦有关中共抗战报道的颇有新闻深度，重视到抗战前线的采访，重点对中共在抗战中坚持的敌后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活动进行了书写，既有宏观思考，也有细节的观察分析，向外界全面客观地展示了中共抗战及根据地社会的“红色中国”形象。正如有学者曾对其报道风格分析称：“爱泼斯坦是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在这个与国民党统治地区截然不同的地方，去发觉与捕捉一切新生的事物，然后用朴实的话言，具体生动地加以反映。他的特点是：既善于用事实说话，又擅长从丰富的事实中摘取发人深思的事例。”^④1945年后，他在赴英国及美国生活期间，仍然关心支持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爱泼斯坦于1951年回到中国工作，参与编辑《中国建设》杂志，还先后加入了中国国籍及中国共产党，继续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伟大成就，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及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77页。

② 爱泼斯坦著，鞠方安等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第182页。

③ 《书报评介：人民之战》，《新知半月刊》1940年第4卷第5期。

④ 张彦：《爱泼斯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28页。